主编/冯朝晖 责编/张怡 校对/张宸 美编/马佳雯
电话：(010)84078838—6183 本版邮箱：cbzmzk@163.com
2023年1月20日

大型学术画册《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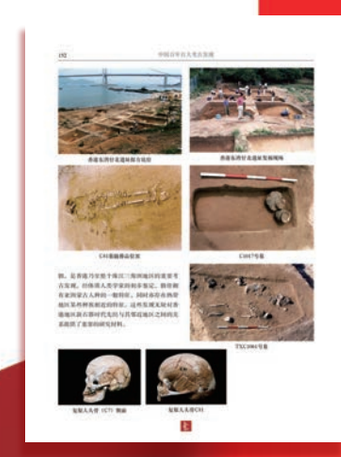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贺信精神，鼓舞广大考古工作者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推动中国考古事业在新的起点上继往开来、再创辉煌，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在遴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基础上，联合编辑的大型学术画册《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日前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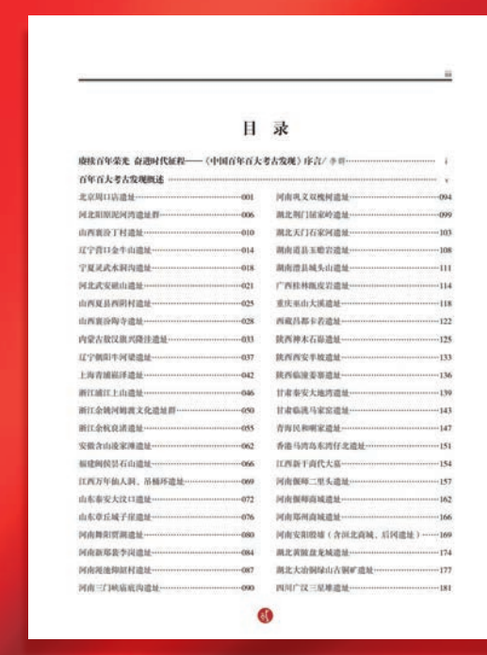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为系统回顾中国考古百年发展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考古学会与中国文物报社共同开展了纪念“中国考古百年”系列活动。2月26日，中国考古学会与中国文物报社就共同开展纪念“中国考古百年”系列活动签订合作协议。4月18日，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支持下，纪念“中国考古百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仰韶村遗址与中国考古百年座谈会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办，系列活动由此拉开序幕。5月8日，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报社联合主办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遴选推介活动启动。遴选推介活动得到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部门和各地考古机构的积极响应，各地推荐了321个项目参评，经过初评，有160个项目入围终评。由白云翔、柴晓明、陈洪海、陈星灿、戴向明、方辉、高大伦、高星、顾玉才、郭伟民、霍巍、焦南峰、李伯谦、李让、李水城、刘斌、刘庆柱、宋建忠、宋新潮、孙华、孙庆伟、孙英民、王光尧、王巍、闫亚林、张弛、张凌、赵宾福、赵辉、赵志军、朱泓、朱岩石（按姓氏拼音排序）等组成的终评委员会，从160项入围终评项目中选出100项入选项目。10月18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开幕，“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隆重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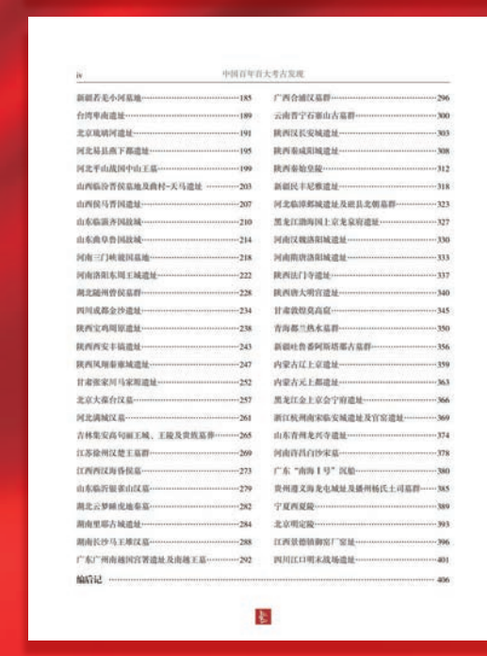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灿若星辰，闪烁着中华文明的耀眼光芒。这些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考古发现，反映了中国考古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的重要成果，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记录、印证、丰富了悠久灿烂的中国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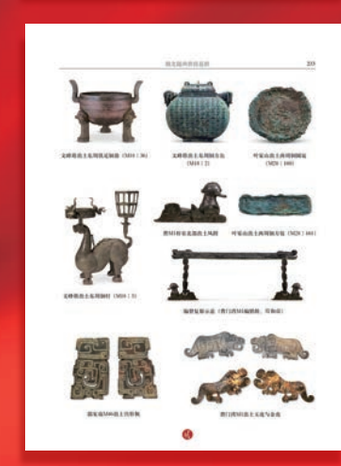
《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亲切关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同志写来序言，给予勉励和鞭策。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同志、陆进同志以及政策法规司、考古司有关负责同志给予悉心指导和支持。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高度重视本书编辑工作，多次沟通研究编纂体例、整体框架、入编内容和出版事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考古机构也积极参与，审核文稿，提供图片。最终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50万字，收录图片2000余幅。

遴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还有一个成果。2022年9月，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局和郑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博物院、郑州市文物局协办的“繁星盈天——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展”在郑州博物馆展出。在展览即将接近尾声时，中国文物报社联合郑州博物馆等单位，推出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线上虚拟展览，让广大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走近珍贵的历史文物，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地区性博物馆发展有关问题

——序三门峡博物馆《崤函遗珍品鉴》

曹兵武

这本《崤函遗珍品鉴》的编辑和出版，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博物馆馆藏珍品的又一次集中呈现，相信可以对大家比较全面地了解三门峡的历史及其文物品类、特色等起到很好的引导和点睛作用。

近年来我国的博物馆事业发展很快，据国家文物局较新的统计数字，全国博物馆总数已经超过6000家，平均约24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达到了世界中位水平。博物馆每年举办展览超过3万个，疫情之前的2019年观众数量已达12亿人次，两者均居世界前列。这说明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为博物馆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经费和物质支撑，公众对博物馆展览和传播教育这样的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也迈上了新的台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一个通过博物馆真切、深入地了解自己的乡土国情，传承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从中汲取历史科学审美养分的中国式文艺复兴正渐渐到来，并成为古老的中华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强有力的支撑点。

三门峡的文博事业也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不仅三门峡市博物馆近年不断对基本陈列进行优化，大力举办各种临时性展览，还开展了一系列深合国情民意的宣教、出版、传播等业务活动。同时，借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百年（2021年）之际，对考古圣地渑池县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博物馆进行升级改造，在灵宝西坡、北阳平等遗址进行仰韶文化考古成果大型现场展示，尤其是配合庙底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新建庙底沟博物馆，集全国之力推出“花开中国”大型展览，全面系统地展示仰韶文化尤其是以庙底沟遗址发现和命名的其鼎盛阶段庙底沟时期的文化成就及其在早期华夏族群、文化和文明形成过程中奠基者的角色与地位，成功入选2021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再加上之前依托西周时期虢国考古发现建设的早已蜚声海内外的虢国博物馆，三门峡已经形成了一批独具特色并跻身于国家级博物馆强馆和优秀展陈之列的文博工作品牌。

博物馆是现代国家、地方或者城市的记忆器官，扮演着激活历史资源、激发可持续发展动能的重要作用，是重要性与日俱增的公共文化设施。作为一个地级城市，三门峡的博物馆与文博工作成绩辉煌夺目。不过，在这样的背景和形势下，也特别需要认真思考一下三门峡的博物馆事业进一步发展、博物馆及其展陈体系优化完善、乘势迈上新时代新台阶等重大问题。借助重大考古新发现的遗址博物馆、特色博物馆固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跃居同行前列，吸引众多关注，但在现有体制机制之下，综合馆的藏品体系和展览等业务能力也势必受到一定的局限，后续持续吸引观众尤其是外来游客等问题也值得注意。因此，系统调查和分析区域内的文博资源，谋划和完善博物馆及其展陈体系建设，逐步形成体现三门峡的总体形象品牌和文博工作的集群效应，对内系统支撑公民素质教育和文化、社会建设，对外吸引游客，产生旅游、宣传等经济效益，就既需要突出特色馆和特色展陈，也需要着力打造区域性的综合馆、窗口馆；既需要加强国有馆建设，也需要扶持民办馆来拾遗补缺；既需要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底蕴，大力发展和完善历史、民俗类博物馆，也需要关注自然环境和科技类、专题类博物馆及其陈列展示的建设，并不断优化文博工作体制机制，强化文博人才培养贮备和效益发挥等基础工作。

三门峡位于黄土高原与黄河中下游平原过渡地带，中国历史上的西安与洛阳两京之间以及黄河大拐弯的枢纽部位，地理区位优势明显，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得天独厚，博物馆体系和具体的博物馆都应该充分考虑自己的合理定位，在发挥优势、突出特色的前提下，逐步形成三门峡博物馆事业的整体品牌效应和具体的示范窗口，尤其是应该打造好涵盖区域性的自然、人文、历史、民俗等方面内容的中心馆、龙头馆，作为发挥城市客厅作用的综合性、引导性窗口。为此，应该系统规划全域中的自然和文化遗产资源、馆舍体系定位，谋划新发展格局，完善馆际交流合作机制，以点线面结合的方式，用文化和自然遗产为载体，共同讲好三门峡故事，讲好黄河文化乃至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发展壮大的故事以及其中的三门峡贡献和三门峡力量，充分挖掘博物馆潜力，开展乡土乡情教育，促进旅游和经济发展，以及公共文化建设，涵养公众素质，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希望更多更好的介绍三门峡文物古迹和文博工作成果的作品能够面世，期待三门峡博物馆和文博事业更上层楼，让古老的崤函遗珍焕发出新时代的璀璨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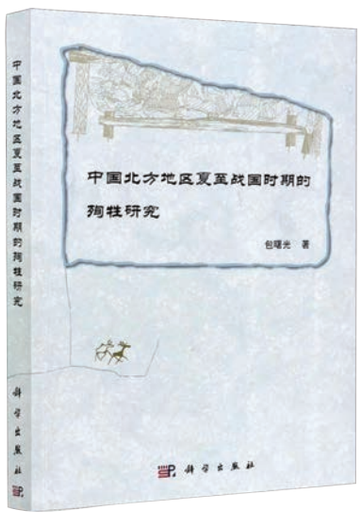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动物与人类社会

——《中国北方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殉牲研究》读后

钟雪

考古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复原古代人群的生活面貌，研究者们从物质材料出发，可以选择不同的研究对象，从不同角度入手进行科学合理的阐释，《中国北方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殉牲研究》一书通过殉牲这一特定的角度，为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情景、埋葬习俗、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等提供了重要参考。



书中以长城地带沿线的中国北方夏至战国时期以及新疆和欧亚草原东部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动物殉牲资料为研究对象，将其纳入所在地区、考古学文化、墓地中的墓葬形制、共存随葬品和埋葬位置等背景，从殉牲现象背后的行为模式和生业方式及其所反映在生态、经济类型、族群辨识和社会意义等方面的角度出发，揭示了中国北方地区和欧亚草原东部区农牧混合经济向游牧经济过渡的动态发展历程。本书通过探讨西北、内蒙古中南部、晋中、晋北及陕北、燕山南北、东北、新疆和欧亚草原东部区的殉牲特点和变化趋势，得出以下三方面结论：

按照殉牲的总体特点将中国北方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社会发展情况划分为夏至早商时期、商晚期至西周晚期、东周时期三大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典型特征，但就整体而言又遵循了同一发展轨迹。在殉牲种类上，三阶段的殉牲主体动物经历了“猪→牛、羊→羊、牛、马和狗”的变化；在殉牲部位上，三阶段分别对应“下颌骨→头骨和肢骨→头骨和蹄骨”；在殉牲数量上，可以简单地归纳为是一个由少到多的过程。殉牲的轨迹特征表明了中国北方地区各阶段的经济类型为第一阶段以定居农业为主，辅之以家畜饲养业和狩猎业；第二阶段仍以定居农业为主，畜牧业所占的成分比例大大提高；第三阶段至少在春秋中期之后，就已走上早期游牧化经济道路。

将欧亚草原东部区殉牲的发展情况划分为公元前三千纪、二千纪和一千纪三大阶段，殉牲习俗相较于中国北方地区出现得要早，目前研究结果表明前者的第二阶段相当于后者的前两个阶段，两者的第三阶段大体同时。

殉牲是古代人类祭祀仪式活动和宗教信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象征着势力和权威，具有凝聚社会和稳定秩序的作用。欧亚草原东部区和中国北方地区这类殉牲形式和仪式的源头或可起源于奥库涅夫文化和切木尔切克文化，战国晚期由于长城的兴建，原本一致的殉牲习俗被割裂——长城以内融入中原体系，殉葬完整的车马；长城以外为匈奴文化体系，殉牲依旧发达。

纵观全书，该书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建树：

第一，收集资料全面、翔实。将原长城一带的中国北方扩展至包括新疆和东北在内的中国大北方；利用黑龙江大学学生的俄语语言优势，对欧亚草原东部区的相关殉牲资料进行收集和翻译，实属国内首见。

第二，编写体例完整、系统。该书在内容上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相关研究概念的厘清；第二部分分区对中国北方地区的殉牲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分析，同时对比了与欧亚草原东部区在殉牲特点上的异同；第三部分结语中概括和总结了中国北方地区殉牲的时空变化及其背后的历史意义，并对殉牲相关问题进行了简要讨论。这种逐层递进的叙述方式，使本书从具体的考古学文化分析上升到社会结构研究这一过程。

第三，“因区施策”，研究方法具有综合性、国际化特点。近年来，中国考古学更多地注重多学科交叉研究，包曙光先生采用动物数量统计法，在殉牲动物的鉴定结果基础上展开动物性别、死亡年龄以及有无切割痕迹等进一步鉴定和讨论工作，是中国北方地区的首次尝试。同时结合国外学者在畜产品开发方面的成果，借鉴“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的研究经验，运用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研究方法。

综上，正如杨建华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写：“该书在殉牲现象的深入研究和背后的历史意义的讨论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是作为系统讨论整个中国北方殉牲现象的第一本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中国北方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殉牲研究》
作者：包曙光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5月
定价：138元